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四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开明绅士刘少白

郭秀翔
著

刘少白从开明绅士到共产党员,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一生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子女们相继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刘氏一家成为晋西北著名的革命家庭。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王灵善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4辑)

开明绅士刘少白

郭秀翔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字数:300千字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34-61-6
G·95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艰难求学	(2)
二、投身革命	(7)
三、创办银行	(11)
四、勤政务实	(23)
五、三赴延安	(30)
六、响应土改	(42)
七、老骥伏枥	(45)
八、含冤去世	(52)

引 子

1948年3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曾谆谆告诫党员干部：“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称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刘少白及其他开明绅士在抗战时期及其以后所作贡献的极大肯定。

毛泽东所说的开明绅士刘少白，其实在193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从开明绅士到共产党员，刘少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一生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刚直不阿，矢志不渝。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晋西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勤政务实、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的子女们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都相继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晋西北著名的革命家庭。

一、艰难求学

刘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6月30日，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

黑峪口是晋西北一个古老的商贾重镇，它西濒黄河，东临诸山，山清水秀，地杰人灵。刘少白的曾祖父是个商人，勤俭治家，诚信经商，凭借着黑峪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卖烧饼起步，逐渐发展到跑河运，开药铺，成为村里首屈一指的富户。刘少白的父亲刘守谟，开明正直，有反清思想，曾给刘少白取名“国栋”，意思是希望少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但刘守谟没有经商才能，家业传到他手里时，逐渐衰败，仅靠地租度日。

刘少白6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他对读书很感兴趣，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来读书，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13岁时，刘少白考入本县县城崞山书院读书，这是一座比较开明的书院。在这里，刘少白不仅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且逐渐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当时，黑峪口村设有税卡、警所，差役到村上，不是催粮就是逼税，动不动就抓人、派差。刘少白看到这些现象，气愤地说：“这些官兵就是强盗”。从这样一些事上，刘少白逐渐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情绪。有人仗势侵吞刘家的财产，刘少白的父亲刘守谟告到县衙，对方花钱贿赂官府，刘守谟败诉。刘少白不服，亲自到太原巡抚衙门告状，据

理力争，最终取得胜诉。通过这一经历，刘少白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磨炼了他的胆略和意志。

1900年，刘少白从崞山书院毕业后，与兴县韩家吉村女子牛秀莲结婚。秀莲虽是地主家出身，但他父亲很开明。因此，秀莲从小就很懂礼貌。结婚后更是孝敬公婆，尊敬丈夫，可谓是一位贤内助。后来，刘少白又娶河北藁城人李芸为妻，秀莲和李芸和睦相处，一家人从未闹过意见。

1903年春，20岁的刘少白赴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科考腐败日盛，金钱和权势已渗透其中，因此，少白应试未中，被拔为贡生。他不满足这一结果，便直奔太原，准备继续读书深造。恰逢山西武备学堂招生，遂报名考入。这是一座在社会上很有声望的学校，创办于1898年，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德文、格致以及军事课战术、筑城、地形等。其时，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等人也在这里读书。刘少白在山西武备学堂勤奋苦读，本想由此学有所成，不料患了胃病，只好中途辍学回乡养病。

1905年，刘少白考入太原府中学堂深造。三年后，又入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攻读法律，由此，开始接受新学。求学期间，目睹列强侵略，清廷腐败，他忧国忧民，立志救国于危难之时、救民于水火之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掉辫子参加反清活动。不久清兵攻入娘子关内，起义军被迫撤出太原，革命党人遭到残酷镇压，刘少白不得不返回家乡避难。那一年除夕，他贴出一副春联：“革命非必好乱，读书岂为做官”。在家乡避难期间，刘少白组织民团，发动群众与县衙斗争，兴办女学，鼓动乡民剪发放脚。县

衙以“煽动暴乱罪名”下令逮捕他，刘少白又离开家乡到了太原。

由于刘少白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因此，1913年，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他当选为议员，并加入共和党。为了追求和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忠实地履行作为一个议员的责任，做了许多有益于乡民的工作，救济灾民，消除瘟疫等。但不久，他就发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民国不民国，共和不共和”，辛亥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广大人民群众依然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让刘少白尤为感到痛心的是，每当他到临时议会开会时，议员们经常激烈争吵，动辄大打出手，写字用的墨盒常常成为对打的武器，在空中扔来扔去。后来，不得不把墨盒固定在桌子上。这种情景，使对民主救国满腔热忱的刘少白深感失望，民主议政运用到这种混乱地步，实在是徒有虚名。1915年，山西省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贿赂之风盛行，刘少白落选。从此，他告别政坛，继续求学。

1915年，刘少白重返山西大学法律科，继续深造。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革命精神，影响、吸引着刘少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刘少白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家新盖的大门落成后，刘少白书写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英文单词，刻在门内上方。他在阅读大量的新书新报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他也有浓厚兴趣，经常去听一些科学报告会。

1918年，刘少白从山西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这

一年,他已经35岁,从6岁入学,在私塾读《四书》《五经》到进入高等学府攻读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民主思想教育,刘少白先后历经29年时断时续的求学生涯,终于成长为一名新式知识分子。大学生活是刘少白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他曾对他的子女说:在他上大学期间,由于家境逐渐衰落,子女多,经济负担重,学校生活很艰苦。自己学会了缝补衣服,经常以一个大饼或两根油条过日子。但就是这样的生活,他感到非常充实。

在大学读书期间,刘少白认识到:国家的衰落,民族的危机,人民的贫苦,都是由于反动旧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的,要改变中国之命运,兴学育人实为当务之急。他认为:人民若无知识,不但不能生存于世界,即在草野乡间也必受人欺侮,此教育为吾人所应有也。兴县僻处山隅,村庄零落,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三,闭塞如此,欲不劣败?只有用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新思想来教育人民、唤醒民众,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才能摆脱受剥削、被奴役的状况。因此,从1913年开始,刘少白就走上了兴学育人之路。

1913年,刘少白在乡里倡导兴办教育,在他的倡导下,办起了兴县国民女子师范学校。该校系初级小学,修业四年。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刘少白在革命新潮的冲击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逐步认识到中国只有以苏俄为师,才是唯一出路。为了实现他兴学育人的理想,1922年,刘少白应聘出任山西省立工

业专门学校秘书长兼国文教员，在此执教期间，积极倡导白话文，他以鲁迅先生的作品和《新青年》上刊登的文章做教材，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并利用业余时间，为学生编写了一套内容新颖，思想进步，语言流畅，文字通俗的国文教材，教育厅为此发给他200元大洋的酬金。

1925年，刘少白支持和协助他的好友、兴县开明士绅牛友兰在黑峪口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黑峪口分校。牛友兰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比刘少白小两岁，他俩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结为“金兰之契”。他们都热衷于社会改革和创办新学。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就是1913年由牛友兰和牛映台、温国钧创办的，是一所新型高级国民小学。为了发展新学，扩大办学规模，又在黑峪口创办了分校。学校开办后，他们倡导科学与民主，把新文化、新思想传播进这偏僻的小山村。并开办了国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等课程，用以取代《四书》、《五经》。

在创办黑峪口二高分校的同时，1925年春，刘少白又支持和协助牛友兰办起了兴县第一所中学——兴县中学，首任校长由牛友兰担任。这是一所完全新式的中学，开设有物理、化学和英语等课程。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教这些课，为此，刘少白在这所学校义务授课，同时，还从忻州、崞县等地聘请了一些教师。

1927年秋，刘少白与牛友兰和兴县劝学所联合，在兴县中学举办了“三民主义”讲习所，由刘少白主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而且，还将新三民主义定为兴县中学的必修课，其目的在于唤醒民众，改革社会，扫

除愚昧、封建迷信思想，提高国民素质。这一举措，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人士纷纷慕名前来听课，接受新三民主义的教育。

二、投身革命

刘少白在家乡创办学校的同时，自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工作。在他的支持下，他的子女都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仅如此，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白还积极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许多共产党员脱离危险，他在北京的住所成为革命同志聚会之处和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

刘少白的长女刘亚雄出生于1901年，到六七岁的时候，按当地的风俗习惯，该缠足了，但刘少白坚决反对给亚雄缠足。因此，刘亚雄成为兴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子。这件事，在当时成了兴县的一大新闻，不少人对亚雄品头评足，嘲讽她是个假小子。后来，刘少白索性让女儿穿上长袍马褂，像男孩子一样到学校读书。1912年，刘少白将11岁的亚雄送到太原读书，两年后，刘少白的二女儿刘竞雄也随同母亲一起来到太原读书。此时，刘少白还在山西大学读书，生活十分困难，但为了支持子女读书，刘少白一面学习，一面在太原阳兴中学兼职，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1915年，刘亚雄考入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刘亚雄带领同学走上街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经过这次运动的洗礼，刘亚雄开始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秋，刘亚雄考入北京女师大，这是当时全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刘亚雄入校后，在勤奋求学的同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女师大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之一。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也就在这一年，刘亚雄和同学赵世兰、许广平等人一起，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赵世炎的领导下，发动学生，掀起了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了在女师大任教的鲁迅先生的支持。刘少白在山西得悉此事后，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并投书《京报》谴责反动当局的暴行。刘亚雄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北京发生了反动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英勇牺牲。刘亚雄等组织女师大学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暴行。此次事件后，女师大开除了刘亚雄等人。1926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送刘亚雄等人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少白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活动，临行前，他专程来北京为亚雄送行。他对亚雄说：“革命的路很长，要刻苦攻读，学有所成，早日回来，报效祖国。”就这样，刘亚雄在父亲的支持下，结束了求学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8年底，刘亚雄回到国内，先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后来又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1928年9月，刘少白经时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的温寿泉邀请，来到北京工作，全家也由太原迁到北京居住，住在城南虎坊桥60号。这里原为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纪晓岚

的故居。不久，刘亚雄担任了中共顺直省委的秘书长，回到北京，此时，她已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学陈原道结了婚。陈原道是1923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他和刘亚雄一起在天津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决定在北京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刘少白的住处就成为中共党员的秘密联络点，并负责转送党中央寄给中共顺直省委的活动经费。

1929年4月，刘少白应傅作义的邀请，到天津商品检验局工作，先是副局长，后升任局长。其时，每月薪金高达500大洋，社会地位虽然高了，但他目睹官场的黑暗腐败，心情却很坏。他在给好友牛友兰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在这革命不彻底的机关里工作，心境之恶劣难以表述。”他身居官场要职，但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不义之财，分文不取。在他离任时，有账外余款三万元大洋，都悉数上交。在北京和天津居住期间，他的住所不仅是革命同志联络之处，而且，他还常常接济遇到困难同志，并数次拿出钱财资助党的组织。仅在北京期间，他就曾一次拿出大洋两千元资助党组织。刘少白为支持革命，真正做到了仗义疏财。

不仅如此，刘少白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曾掩护许多共产党员脱离险境。他在担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期间，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支持革命。同时，他还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帮助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参与营救过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等中共著名党员。

1930年初，刘少白借到上海出差的机会看望在中共江

苏省委工作的亚雄，住在上海东方饭店。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他的姐姐赵世兰正遭敌人追捕。赵世兰和刘亚雄是女师大时的同班同学，并一起领导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两人情同手足。亚雄把刘少白来沪的消息和所住的旅馆告诉了赵世兰。这一天，赵世兰和另外一名地下党员发现又被敌人跟踪，情况十分危急。她知道亚雄的父亲素来支持革命，于是，她便跑到东方饭店，找到刘少白，说明情况。刘少白当即不顾危险，把赵世兰等藏了起来，掩护她们躲过这次追捕。

1931年，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刘亚雄、陈原道被捕入狱，刘少白的住处也受到了监视，为此，刘少白不得不逃到大连，后来又到了晋北大同。在这里住了三年，因无职业，全家生活十分困难。1934年，刘少白得悉傅作义担任了绥远省主席，便动身前往绥远，经傅的举荐，在绥远乡村教育工作训练所担任政治主任。刘少白在此工作了两年，为发展绥远乡村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党组织派到绥远工作的同志，大都同他有过密切的接触，得到过他的帮助。1936年冬，刚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刘澜涛被北方局派到绥远开辟工作，他根据刘亚雄的介绍，找到刘少白，希望能够通过刘少白的关系找到一份工作以掩护身份。刘少白热情接待了他，并托人先是将刘澜涛安排到一家报馆当编辑，后又介绍刘澜涛到兴和县县长孟文仲处工作。刘澜涛到兴和县后，做通孟文仲的工作，发动民众，开展革命斗争。不久，这些活动就被特务侦知，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抓捕刘澜涛，刘少白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刘澜涛逃离兴

和县,使刘澜涛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刘少白在绥远期间,得悉久闻大名的共产党员王若飞就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便多次劝说傅作义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表示:“事关重大,实难从命。”此事虽没有办成,但经刘少白的奔走游说,使王若飞在狱中的情况有所改善。刘少白经常给狱中的王若飞送书、送物,狱方也在伙食上有所照顾。后来,王若飞又被转押到太原,经薄一波、彭雪枫等人营救,得以出狱。出狱后,王若飞曾多次对家人说:“刘老伯的女儿刘亚雄,是我党较早经得起考验的女党员之一。他本人亦为党作了不少工作,我是非常敬重他的。”少白得悉这番话后,对子女说:“人谓道不同不与为谋,既是志同道合,就理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何言感谢?”

三、创办银行

1937年1月,刘少白辞去绥远的工作,回到太原。此时,王若飞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后,也暂时在太原居住。刘少白得悉后,就慕名前去王若飞家中,二人的关系日渐密切。在与王若飞的多次接触中,刘少白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刘少白的家中也成为革命同志聚会之所,并购置了印刷机器,专门为党组织印刷文件等资料。这一时期,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刘少白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他的大女儿刘亚雄和二女儿刘竞雄也相继来到太原,刘亚雄参加了牺盟会组织的女兵连,担任政治指导

员。刘竞雄和安子文结婚后，随同安子文一起来到太原，开展革命活动。

这一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于7月8日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1日，日本首相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对华北大举进攻，随后日军源源不断地被派到中国。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改编后的红军于8月底到9月间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与共产党发动全民族抗战的行为，坚定了刘少白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8月初，经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刘少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54岁。他在递交的《入党志愿书》中，追述了他的思想变化过程：“我从科举到革命，历经过国内外许多大事变。辛亥革命的失败曾使我大失所望，产生孤高傲世之慨！但是，‘五四’运动结合了中外的革命新潮，又使我感到中国革命将有新的发展与新的阶段，这是我思想倾向分点。

于是我一面教学，一面求知，对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已逐步的领会，并有苏联革命为现实借镜，因而在教学方面就

影响了学生。故以传播新思想而被黜，迨至‘四·一二’事变后，革命志士惨死无数，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徇顾。”刘少白的这段话，向党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党的忠诚、信任和热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刘少白入党后，为了便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经北方局批准，以一名秘密党员身份开展工作。党的组织关系最初是和王若飞直接联系，回到兴县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直接和关向应、林枫联系。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山西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日军“右翼迂回”的攻势，对八路军已作了分散配置的部署。八路军3个主力师分兵挺进敌后，迅速实行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在晋西北地区，太原失守之前，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即由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组成了工作团，深入岢岚、兴县、岚县、静乐、五寨、保德等14县，与中共晋西北工委配合，初步建立了县、区党组织和各群众救国团体及群众武装。太原失守后，贺龙率第一二〇师主力开赴晋西北地区，广泛展开于管涔山区各地，全面开展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到1937年底，晋西北地区群众性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群众抗日团体普遍建立，八路军、地方游击队、自卫队等抗日武装得到迅猛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此时，刘少白根据党的指示也回到了兴县。由于兴县西